**2008 年11 月17 日，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， 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。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：“司徒雷登，1876-1962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。”**

**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 年发表的名文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开始的。其实，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，或者说完全是隔膜的。闻一多先生《最后一次讲演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，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话，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他说：“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，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，是教育家，他生长在中国，受的美国教育。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， 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， 从前在北平时，也常见面。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，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，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，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，**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，美国才有这转变。”

这算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：在20 世纪中叶之前，司徒在中国的影响的确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， 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“燕园之父”

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。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，一是传播基督教，先在杭州传教，后来到金陵神学院教书，前后大约15年；二是创办燕京大学，从1919 年到1946 年；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，为时不足3 年。司徒在燕京的20 多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，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。

他对中国高等教育、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，被誉为“燕园之父”当之无愧。到晚年老病之时，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“实现了的梦想”。司徒六十生日时，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，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、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。

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。我很同意这个判断。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仅举其大者：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、到处奔走筹款，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。1918 年12 月当他受命之时，这是“一所分文不名，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”，学生不足百人，教授只有20 多人，其中中国籍的2 人， 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。从1919 年到1937 年抗战爆发时，他十数次赴美，募到大约250 万美元，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。1934 年到1937 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 万元，并且从“庚子赔款”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.5 万元，但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，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1/10。

除在筹款方面长袖善舞之外，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，更有赖司徒确立的办学方向，一开始就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、思想自由的空气。他在聘请教授时，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，不问政治倾向、宗教信仰，也不管学术流派。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、真正意义上的大学，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， 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。说白了，在他看来，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。

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， 无不显示出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。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 年在这里诞生的，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。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，1945 年9 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位中国记者———朱启平、黎秀石、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，朱启平那篇通讯《落日》已成了传世之作。

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、林迈可，社会学家许仕廉、雷洁琼，人类学家吴文藻，考古学家容庚，神学家赵紫辰，法学家张友渔，哲学家张东荪、洪谦、冯友兰，史学家顾颉刚、钱穆、邓之诚、韩儒林，政治学家萧公权， 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、记者斯诺等人，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，有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林庚、顾随、郑振铎、陆侃如、冯沅君、冰心等。

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，他在经济系开“社会主义”课，在

课堂上讲《资本论》，有一次他问：“看过《资本论》的请举手。”结果没有一个人。他摇头叹息：“《资本论》都没有看过，主修什么经济系！ ”这一来，学生都抢着去找《资本论》了。

司徒说：“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。”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 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：“他在燕大讲学， 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……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，并且他可放言高论，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， 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，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，且予以保障。”

“中国化”是他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。司徒曾说：“我们的目的，是以养成一种合作、建设、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……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， 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，而是要成为‘现在中国’最有用的学校。”1949 年之后，燕京教授和学生中先后有56 人被评为院士，成绩不可谓不显著。但在他看来，

“中国化”并不排斥“国际化”。虽是教会大学，燕京校园里弥漫的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， 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、学生的制度，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，各取所长，融会中西，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“燕大精神”。

当1937 年日寇入境，北平沦陷，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的自由“孤岛”，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一个堡垒。

在张东荪、陆志韦、夏仁德、林迈可这些抗日教授的背后，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，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4 年之久，不断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、急需的战时物资。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，被他以美国“治外法权”的理由断然拒绝，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，他总是伸手救助，决不坐视。1941 年12 月8 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包括他和洪业、张东荪等教授，还有学生30 多人被捕。在身陷囚牢的3 年8 个月中，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，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，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，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，声望如日中天。

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

“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”，“你们必晓得真

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他和几个同事将《圣经》中的这两句

话熔铸在一起，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：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”。这

一校训植根深远，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，造就了几代学子，

影响至大。

20 世纪末，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书信中谈及了各自母校的

校训。1940 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说：“你引哈佛大

学的校训中有‘真’，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‘因真理得自由而

服务’（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），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。”1938 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、逻辑尤其敏感，他在3 月6 日的回信中说：“燕京大学校训‘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’，前半句我能理解，后半句我不理解，‘自由’与‘服务’有什么关系呢？ 望解释一下。

“我的母校浙江大学（我是1942 年毕业，当时在贵州）的校训

也与真理有关。只有两个字：‘求是’。”

李慎之在3 月11 日回信：“‘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’ 是相连贯

的。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，但是得了真理不（仅）是要服务

于人类，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，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。”

即便相隔多少年后， 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：“良师益友如

琢如磨，情志每相同；踊跃奋进，探求真理，自由生活丰……”，仍常常禁不住哽咽。这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所在，是教育在人心

中播下的种子。（摘自《读者》）